

共同富裕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 生计策略与生计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

陈绍军^{1 2}, 马明^{1 2}, 陶思吉^{1 2}

(1.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2.河海大学中国移民研究中心,江苏南京 211100)

摘要: 960多万人口的易地扶贫搬迁,有73%以上的搬迁人口在西部地区,如何实现搬迁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关键。基于三区三州怒江州少数民族515户的调查数据,建立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耦合协调类型、生计策略选择和转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搬迁移民现阶段生计资本水平较低,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稳定恢复期;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样类型搬迁移民家庭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优于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在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中,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对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负向影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移民家庭有正向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对生计多样类型移民家庭有显著影响;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其中家庭资产数量、家庭收入、就业技能培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用;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是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其中居住地生态环境、房屋面积、家有资产数量、家庭收入、银行贷款、就业技能培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用。基于此,少数民族脱贫移民后扶时期需从加强就业技能培训,加大信贷力度,做好土地资源的增收,深化东部与西部的协作,注重县域产业培育等入手。

关键词: 共同富裕;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生计选择;耦合协调类型;后续扶持

中图分类号: C911; D63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23)01-0094-15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国八百三十二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九百六十多万贫困人口实现易地搬迁,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易地扶贫搬迁是为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发展问题的特殊扶贫方式,具有空间跨度大且涉及多重社会问题等特点,实践中

以城镇化集中安置的方式为主,并呈现出“从无到有再到无”的螺旋式演进动态过程,不仅涉及空间转换和资源整合,还包括可持续生计能力建设和产业培育有序衔接等问题。由此带来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家庭承包地、宅基地、集体资产等政策的改变,必然直接冲击易地扶贫搬迁移民

引用本文: 陈绍军,马明,陶思吉.共同富裕视域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生计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1):94-1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18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河海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项目(B220203017);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KYCX22_0692)

作者简介: 陈绍军(1965—),女,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移民社会学和项目社会评价研究。E-mail: shaojun_chen@hotmail.com

家庭原有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改变自然、社会、人力、金融和物质等生计资本的构成和组合应用,从而影响以就业为基础的核心生计,进而可能带动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家庭生计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公开的材料可知,2020年12月,国家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怒江州26.9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其中易地扶贫搬迁10万人^[2-3]。当下,西部地区为高质量完成国家“十四五”规划目标,在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战略的过程中,避免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移民生计恶化或再度返贫问题值得关注。易地搬迁移民的生计策略选择、转化与生计后果直接相关,因此,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的生计策略选择及转化的影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这关系着国家“十四五”时期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搬迁脱贫移民的生计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十四五”期间,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家庭生计的发展关键在于生计策略的选择,生计的可持续发展则需要考虑不同生计策略间的转换及两者的影响因素。本研究为回答好此问题:一方面,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搬迁移民的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类型;另一方面,以怒江州为例,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系统探讨生计资本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同时分析生计策略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的移民家庭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样类型转化的影响因素。通过此次研究,旨在更加清楚地认识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选择及生计发展规律,对具有不同生计资源禀赋的搬迁移民进行精准帮扶,进而实现后扶时期搬迁移民生计的顺利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一、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易地扶贫搬迁是移民空间转换和资源重组的过程。移民经历了从分散居住的村落汇聚到新建城镇社区,易地搬迁社区呈现出“新主体陌生人社区”的结构特征^[4]。与此同时,易地扶贫搬迁移民实质上经历了空间性的再造,由乡土性的空间性转变为城市性的空间性,如此剧烈的空间再造将会给搬迁移民的生计适应带来较大困

难^[5]。由于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空间结构与空间关系发生改变,移民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传统生计方式均发生改变^[6],这种现代化转变对于少数民族地区而言更为艰难。如,有学者对广西易地搬迁移民的研究发现,搬迁户的兼业行为趋势明显,纯农户的比例下降^[7]。生计策略选择是脱贫移民后期扶持的重要内容之一,易地扶贫搬迁一方面实现了移民从农村向城市、城镇、乡镇的空间转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移民居住环境优化、就业机会增多等资源禀赋变化。受以上观点的启发,此次研究框架从空间转移、资源禀赋变化等角度来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选择何种生计策略能够实现生计的协调发展,以及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和转换的影响。与此同时,转型期的移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生计行为选择存在何种内在关联,这亦是有待系统探究的问题。

1. 生计资本的差异及其后果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关注移民生计资源禀赋的优化组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学者开始将生计问题应用于扶贫领域与农村发展的研究^[8]。如,Chambers等提出生计是谋生的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和活动的基础之上^[9-10];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金融资本这5种生计资本是生计的核心内容,且不同的资产组合可达到不同的生计结果^[11-12];McDowell等的研究进一步指出了迁移与可持续生计的关系^[13]。搬迁后,移民原有的生计资本存量及结构发生改变,需围绕生计资本内涵培养移民可持续生计的累积能力^[14]。目前,国内学者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就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问题展开了较为丰富的探讨。如,严登才通过对比水库移民搬迁前后的生计资本发现,搬迁对移民生计资本造成了负面影响,主要体现为自然资本损失、人力资本积累薄弱、社会资本功能弱化等^[15]。同时,搬迁安置时间^[16]、安置方式^[17]等因素对搬迁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亦产生了不同影响。有学者对农户生计资本分析发现,农户拥有的生计资产越多,选择生计策略的余地越大,从而越能够提高生计水平^[18-20]。在不同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条件下,生计活动的相互结合有助于生计策略的最终实现^[21],而生计策略的选择过

程也是在家庭收入、资源配置和风险之间寻求最优平衡的过程^[22]。刘伟等发现,不同类型移民的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的影响不同^[23],因此需要针对搬迁后移民家庭面临的生计资本损失、生计策略转变进行精准扶持^[24],以实现生计协调发展。

从已有研究可知,不同类型移民搬迁后的生计资本变化差异较大。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如何变化?不同生计策略的移民生计资本如何?本研究将使用定量研究方法对上述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在展望易地扶贫搬迁整体效用和少数民族移民生计变迁方面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以此构成第一个研究议题。

2. 生计资本耦合协调类型

在探究生计资本如何变迁的基础上,还需厘清现阶段生计资本的耦合协调状态如何?哪种生计策略下的生计资本耦合协调状态最优?这些都是后期扶持绕不开的现实问题。耦合是指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影响与联系^[25],耦合协调度的值越高,表明不同体系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越高。李聪等分析陕西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对农户“福祉-生态”耦合模式的影响发现,收入来源为外出务工汇款的家庭生计多样化水平较高,生态依赖度显著低于其他类型家庭,耦合模式最优^[26];孙特生等引入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模型评判牧区各项生计资本的耦合协调状态,认为推进牧民生计多样化、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有助于增强草地畜牧业人文-自然耦合系统的恢复力^[27];赵雷等通过对比西南林区水电移民安置区内移民与非移民的生计资本及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发现,相较于非移民而言,移民生计资本增长与生计稳定性发展脱钩程度较深,易遭受潜在的生计风险,从而造成生计脆弱性^[28]。

基于已有研究,此次第二个议题着重探讨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现状,即搬迁前后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如何?哪种生计策略更能促成生计协调发展?这亦是一个尚未受到关注的新讨论点,有助于评价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益,并有利于剖析少数民族移民在转型期等多维因素驱动下的生计选择。

3. 生计策略与生计行为选择的影响

在分析易地扶贫搬迁生计资本耦合协调类型的基础上,亦需要关注移民家庭的生计资本对生计行为选择、不同生计策略之间转换的影响。已有研究提出,生计资本是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基础^[29-30],且扶贫搬迁效果的关键在于搬迁农户选择的生计恢复策略^[21]。研究发现,农户生计策略是根据生计资本禀赋所做出的行为策略^[31],农户拥有的生计资产越多,选择生计策略的余地就越大,从而越能提高生计水平^[18-20]。在不同生计资本水平和结构条件下,生计活动的相互结合有助于生计策略的最终实现^[21]。根据研究主题的不同,学者们虽然对生计策略的分类有所差异,但都将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纳入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25, 29, 31]。此外,不同类型移民的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的影响不同^[21],如农业和非农业为主的移民生计策略影响有显著差异^[32];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较好的移民一般采取以农业为主的生计策略为家庭增收,而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较好的移民一般采取非农业为主的生计策略^[30, 33-35]。针对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生计资本将对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行为的选择产生何种影响?随着其生计资本结构和水平的变化,生计资本又将如何影响移民生计策略间的转换?上述问题也值得深入探讨。

综上,相关学者对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均有一定研究,亦取得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成果。后期扶持的关键是实现移民在迁入地的可持续发展,其中的重点是移民生计的协调发展,而进一步就应该探讨在空间转换与资源重组的过程中选择什么样的生计策略,因为这是移民对家庭生计资源禀赋进行重新配置的决策和过程。基于前人研究基础,本研究对少数民族地区生计资本变化、不同生计策略移民的生计资本差异、生计资本对移民生计行为选择产生的影响和生计资本对移民生计策略转换的影响等进行探讨。

4. 分析框架的构建

易地扶贫搬迁是移民空间转换和资源重组的过程,搬迁后,移民实现了“人”的空间转移,但如何实现“人”在迁入地的可持续发展,关键

在于解决移民生计的协调,重点在于空间转换与资源重组的过程中对生计策略的选择,其实质是移民家庭通过评估所拥有的生计资源禀赋达到资源的重新配置。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可知,深度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有以下特点:搬迁前,移民群体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基本生活在高寒的半山腰,文化程度低,汉语普及率低,绝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生活,土地依赖性高,生计策略单一,家庭收入低;搬迁后,基本为无土安置,生计转型条件受限,但生态环境有所改善,移民就业机会增多,家庭收入提升较好,生计策略的选择差异较大,其生计策略更易受到资源禀赋和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①易地搬迁移民生计发展受空间转移和资源禀赋变化的影响。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扶贫政策,一方面实现了易地搬迁移民从农村向城市、城镇、乡镇的空间转移,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移民居住环境优化、就业机会增多、就业能力提升、土地资源盘活、增收机会增多等资源禀赋的变化。毫无疑问,空间的转移和资源禀赋的变化会影响易地搬迁移民的生计活动。

②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及类型差异。主要分析搬迁前后移民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及类型差异,同时考虑不

同生计策略,旨在更好地评价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应,并有针对性地分析哪种生计策略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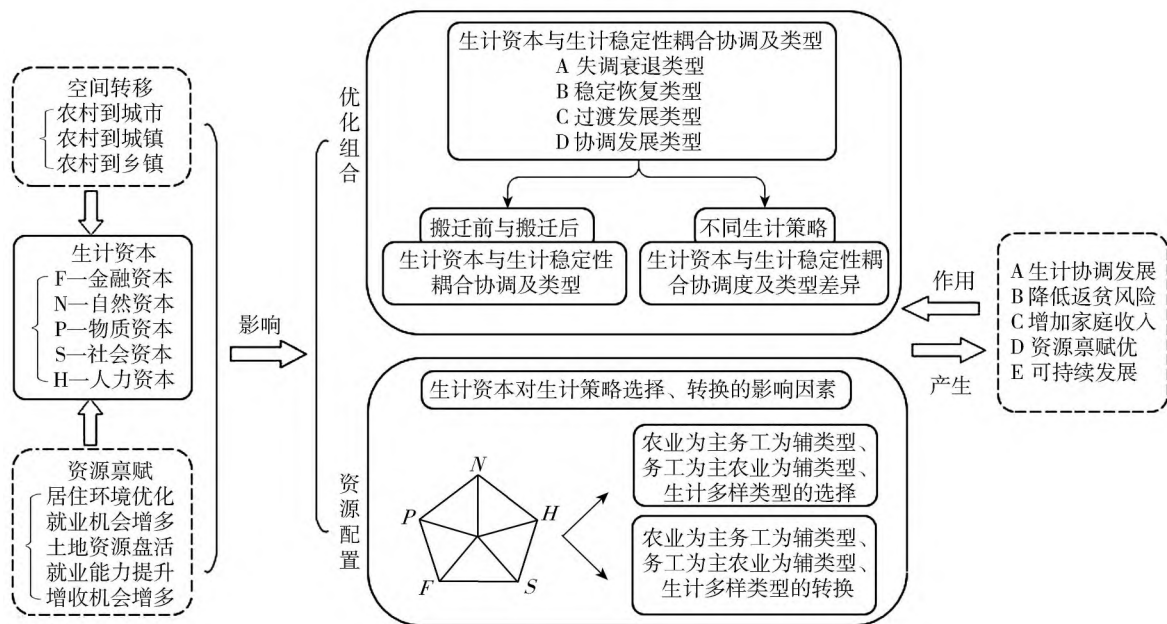
③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参考已有研究并结合怒江州易地搬迁移民实际的生计行为,将生计策略分为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和生计多样类型三种。其中,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以种植、养殖为主,并在闲暇时间就近或外出务工,但务工时间占比较小;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以外出务工和就近打工为主,种植和养殖等为辅,但种植和养殖等务农时间占比较小;生计多样类型包含两种以上的生计方式,是务农、务工、自主经营等多种方式的结合。

④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转化的影响。考虑生计资本是如何影响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样类型的转化,通过借鉴已有研究并结合实际选取五类生计资本(表1)。

二、数据来源与模型构建

1. 数据来源

“十三五”期间,易地扶贫搬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有960多万人。在西部地区的易地扶贫搬迁贫困户中,有691.84万人既处于生态脆弱



注:虚线框不作为具体变量纳入分析,主要为搬迁背景下移民生计影响过程作用机理的补充。

图1 分析框架

表1 生计资本指标类型和取值

资本类型	具体测量指标/单位	变量	权重	赋值
自然资本	户有耕地面积/m ²	N1	0.50	户有水田面积、旱地面积、林地面积相加的总面积
	户居住地生态环境	N2	0.25	Likert 量表法: 非常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非常好, 分别赋值 1~5 分
	户耕地质量	N3	0.25	Likert 量表法: 非常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非常好, 分别赋值 1~5 分
物质资本	房屋面积/m ²	P1	0.30	搬迁房屋面积
	家有资产	P2	0.40	摩托车、小汽车、电视机、洗衣机、冰箱、液化气灶、自来水, 有一项计 1, 最大 7 分, 最小 0 分
	房屋结构	P3	0.30	土木、砖木、瓦砖、混凝土分别赋值 1~4 分
金融资本	人均年收入/元	F1	0.60	家庭年收入/家庭人口数
	能否贷款	F2	0.13	能否金融机构(银行、信用社)获得贷款, 能赋值 1 不能赋值 0
	能否借款	F3	0.13	能否从亲戚朋友处获得借款, 有赋值 1 没有赋值 0
	是否有银行存款	F4	0.13	是否在金融机构(银行、信用社)有存款, 能赋值 1 不能赋值 0
社会资本	人际交往	S1	0.25	Likert 量表法: 非常差、比较差、一般、比较好、非常好, 分别赋值 1~5 分
	人情往来开支/元	S2	0.25	一年内参加红白喜事的开支总额
	人情往来次数	S3	0.25	一年内参加红白喜事的次数
	人际信任度	S4	0.25	Likert 量表法: 非常不信任、比较不信任、一般信任、比较信任、非常信任, 分别赋值 1~5 分
人力资本	是否接受相关技能培训	H1	0.40	接受相关技能培训赋值 1 没有赋值 0
	是否参加农村合作社	H2	0.30	参加农村合作社赋值 1 没有赋值 0
	家庭非农就业人口	H3	0.30	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数

区又处于深度贫困区,占比分别为 74.98%和 73.04%^[36]。其中,云南省易地扶贫搬迁人数为 99.6 万人,是全国易地扶贫搬迁人口最多的 3 个省份之一,占比 10.42%,而怒江州总人口 55.4 万人,易地扶贫搬迁人口 10 万人^[3,37]。由于怒江州是三区三州和直过民族地区,同时也是中国民族族别成分最多以及人口较少民族最多的自治州,曾是集“边疆、民族、直过、山区、贫困”问题为一体的国家层面深度贫困地区,因此怒江州易地扶贫搬迁后如何避免移民生计恶化或大规模返贫问题值得关注,对其他地区亦有借鉴意义。

云南省西北部的怒江州多为高山峡谷地貌,76.6%的耕地坡度在 25 度以上。受资源、区位等影响,该地区群众曾靠山吃山,以传统的小农经济为主,收入依赖耕种与养殖。脱贫攻坚期间,怒江州实施了 10 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占怒江州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一、贫困人口的三分之一^[3]。易地扶贫搬迁后,该地区重点盘活宅基地、承包地、山林地资源,以农村合作社为基础,发展药材种植、蔬菜种植等特色现代农业;借助东部和西部的协作与帮扶,开展劳务输出,提升就业。此外,怒江州大力建设基础设施,以旅游带动发展,将高山峡谷特色风景作为重要扶贫产业。由于怒江州特殊的地势地形及生态环境,搬迁户基本都安置在市、县、乡镇周

边,为无土安置。受怒江州土地政策的影响,部分移民仍可定期回迁出地耕种或参加农业合作社进行农业生产。

本研究主要在怒江州深度贫困地区采取实地参与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访谈法,所调研搬迁户的搬迁时间约为一年半。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根据怒江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实际情况,按照 1 户 1 份的原则,分别在泸水市 TY 社区、DLT 社区安置点发放问卷 150 份,兰坪县 YA 安置点、ZH 安置点发放问卷 250 份,福贡县 SYL 安置点、ZZL 安置点发放问卷 150 份,共收回有效问卷 515 份,调查涉及 2352 个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其中,少数民族搬迁户占比 98.3%,涵盖了怒族、独龙族等直过民族。

2. 模型构建

一方面,采取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少数民族搬迁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发展的现状;另一方面,采取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预测生计资本对不同生计策略之间转换的贡献率。

(1) 变量设置与指标选取

通过借鉴已有研究,结合实际情况选取生计资本的二级指标(表 1)。选取五类资本共 17 个二级指标构成生计资本,选取家庭资产多元化、人际信任度、非农就业人口数等指标测度生计稳定性^[25],从而构建搬迁移民生计资本与

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型。在回归模型中,自变量为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共五类生计资本。自然资本包括户有耕地面积、户居住地生态环境、户耕地质量,物质资本包括房屋面积、家有资产、房屋结构,金融资本包括人均年收入、能否贷款、借款能力、银行存款,社会资本包括人际交往、人情往来开支、人情往来次数、人际信任度,人力资本包括是否接受相关技能培训、是否参加农村合作社、家庭非农就业人口。

由于生计资本的具体指标计量单位不同,参考已有研究^[14],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使指标值均处于0~1,并采用综合指数法计算易地扶贫搬迁家庭单项生计资本总水平和生计资本综合水平,得出介于0~1的综合指数。

(2) 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度模型

用生计稳定性反映搬迁移民生计发展与恢复现状可更为准确,通过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搬迁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发展的机制。耦合协调度是反映不同体系和内在因素之间相互影响、作用和协调的机制,耦合协调度的值越高,表明不同体系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越高。

$$C = \left[\frac{s_1 s_2}{\left(\frac{s_1 + s_2}{2} \right)^{\frac{1}{2}}} \right]^{\frac{1}{2}} \quad (1)$$

$$D = \sqrt{CT} = \sqrt{C(a_1 s_1 + a_2 s_2)} \quad (2)$$

式中: C 为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度; s_1 为生计资本总值,通过生计资本二级指标值加权而得; s_2 为生计稳定性综合值,通过各指标值加权而得; D 为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度; T 为生计资本总值与生计稳定性总值的综合值^[25]。其中,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处于同等重要地位,即 a_1 和 a_2 分别占 50%。耦合协调类型划分详见表 2。

表 2 耦合协调度的划分及类型

耦合协调类型	耦合协调度值
失调衰退类型	[0, 0.2)
稳定恢复类型	[0.2, 0.5)
过渡发展类型	[0.5, 0.8)
协调发展类型	[0.8, 1]

(3) Logistic 回归模型

建立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和生计转换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将生计策略作为因变量(Y),涵盖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样类型三种。因变量是一个多元变量,是指搬迁移民如何根据安置区的资源和自身可利用的资源禀赋选择有效的生计策略,以实现不同资产优化、组合来应对风险和冲击,并在不同生计策略的转变中寻求生计协调发展的目标。

基于二项式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生计多样类型的易地搬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模型(3)中,搬迁移民生计策略为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定义 $p_{y_1} = 1$,若不是则 $p_{y_1} = 0$; x_i 为解释变量, $b_{10} + b_{11}x_1 + \dots + b_{1m}x_i$ 为待估计系数;模型(4)和模型(5)依此类推。增加模型系数的 Omnibus 检验、模型共线性问题、 R 方、HL 检验的数值,以解释模型是否成立。公式如下:

$$\ln [p_{y_1} / (1 - p_{y_1})] = b_{10} + b_{11}x_1 + \dots + b_{1m}x_i \quad (3)$$

$$\ln [p_{y_2} / (1 - p_{y_2})] = b_{20} + b_{21}x_1 + \dots + b_{2m}x_i \quad (4)$$

$$\ln [p_{y_3} / (1 - p_{y_3})] = b_{30} + b_{31}x_1 + \dots + b_{3m}x_i \quad (5)$$

为揭示搬迁移民不同生计策略间的转化规律,采取多项式 Logistic 回归模型,将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赋值为 0,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赋值为 1,生计多样类型赋值为 2,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作为参照,并在模型中增加模型共线性问题、似然比检验、 R 方的数值,以解释模型是否成立^[38]。

$$\ln(p_{y_2} / p_{y_1}) = b_{210} + b_{211}x_1 + \dots + b_{21m}x_i \quad (6)$$

$$\ln(p_{y_3} / p_{y_1}) = b_{310} + b_{311}x_1 + \dots + b_{31m}x_i \quad (7)$$

公式(6)(7)中,搬迁移民生计策略为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则定义 $p_{y_1} = 1$; 搬迁移民生计策略为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则定义 $p_{y_2} = 2$; 搬迁移民生计策略为生计多样类型,则定义

$p_{y_3} = 3; b_{210} + b_{211}x_1 + \dots + b_{21m}x_i$ 和 $b_{310} + b_{311}x_1 + \dots + b_{31m}x_i$ 为待估计系数 解释自变量的 1 个单位上升或降低所引起因变量的上升或下降,如果 b 大于 0 表示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转化发生率会因自变量的上升而上升; 如果 b 小于 0 表示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转化发生率会因自变量的上升而下降。 x_i 为因变量的解释变量^[29]。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1. 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类型

由表 3 可知 搬迁后 怒江州移民的生计资本为 0.3443 相比搬迁之前的 0.2854 有较大提升 但仍处于不可持续阶段。其中 社会资本搬迁前为 0.0881 搬迁后为 0.0635 移民的社会网络被打破 且短时间内难以构建新的社会网络; 自然资本搬迁前为 0.0740 搬迁后为 0.0717 这是因为州政府重视迁出地的宅基地、承包地、山林地等土地资源流转; 物质资本搬迁前为 0.0532 搬迁后为 0.1119 如安置区的混凝土钢筋结构楼房 安全性高 提升了移民生计风险应对的能力; 人力资本搬迁前为 0.0345 搬迁后为 0.0648 主要是州政府重视移民后续就业培训 移民的就业技能提升较好; 金融资本搬迁前为 0.0357 搬迁后为 0.0324 由于从农村到城镇后生活支出增加及搬迁导致生计重构 社会网络重建需要时间 由此导致金融资本略有下降。

表 3 搬迁移民生计资本

生计资本	搬迁前	搬迁后
自然资本	0.0740	0.0717
物质资本	0.0532	0.1119
金融资本	0.0357	0.0324
人力资本	0.0345	0.0648
社会资本	0.0881	0.0635
总值	0.2854	0.3443

采用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少数民族地区搬迁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发展的机制(表 4)。模型显示 搬迁前 怒江州移民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类型属于稳定恢复期的中期 生计资本、稳定性、耦合度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 这说明搬迁前移民生计资本值较低 生计以农业为主并且生计策略单一。搬迁后 移民的生计资

表 4 不同生计策略、生计资本系统与生计稳定性数据

时间	生计策略	样本占比/%	生计资本综合值	生计稳定性综合值	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
搬迁前	总样本	100	0.2854	0.4565	0.4625	0.4142
	农业为主型	85.4	0.2725	0.4405	0.4413	0.3964
	务工为主型	9.9	0.2945	0.4679	0.4659	0.4213
	生计多样型	4.7	0.2922	0.4517	0.4584	0.4128
搬迁后	总样本	100	0.3443	0.4298	0.4877	0.4298
	农业为主型	23.1	0.3333	0.3601	0.4415	0.3910
	务工为主型	45.2	0.3634	0.4342	0.4928	0.4431
	生计多样型	31.7	0.3641	0.4745	0.5098	0.4622

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类型属于稳定恢复的中后期。与搬迁前相比 生计资本、稳定性、耦合度与生计稳定性的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小 这说明随着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后续扶持的推进、家有生产生活工具的增加和非农就业人口数的上升 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在持续性增加。然而 搬迁移民的耦合协调类型属于稳定恢复期的中后期 仍与过渡发展期、协调发展期有较大差距 这是因为搬迁后移民短时期生计适应和转型依然存在困难 同时 由于产业发展未能及时匹配就业 从而影响生计。因此 后期扶持策略对于解决移民生计发展如何从“稳定恢复期”到“过渡发展期”再到“协调发展期”就显得尤为关键。

虽然搬迁导致移民家庭的生计稳定性降低 但不同类型生计策略的移民家庭生计资本、耦合度、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仍在递增。而且 无论是搬迁前还是搬迁后 相比以农业活动为主的移民家庭 以非农业活动为主的移民家庭在生计资本、耦合度、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均呈递增趋势。这样的“递增现象”在搬迁后更加明显 由此说明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在调整贫困家庭生计资源禀赋、优化贫困家庭生计耦合度方面具有明显效果。此外 搬迁后生计策略以非农业为主型的生计资本、耦合度、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均高于以农业为主型的移民家庭。因此 探究生计策略选择与转化的影响因素至关重要。

2. 搬迁移民家庭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

根据表 4 可知 搬迁后有 45.2% 的移民从事务工为主型的生计策略 31.7% 从事生计多样型的生计策略 23.1% 从事农业为主型的生

计策略。根据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策略、生计资本与家庭收入的影响研究^[24],无论是搬迁前还是搬迁后,生计策略为非农业类型的移民家庭收入均高于农业类型的移民家庭收入。因此,探究生计策略选择和转化的影响因素是提升家庭收入和生计协调发展的关键。

采用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不同生计策略潜在的影响(表 5)。模型 1 显示,在统计学意义上,深度贫困民族地区脱贫后,对易地搬迁移民采纳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的生计策略有负向作用的是物质、金融、人力三类资本,这说明拥有这三类资本越多,易地搬迁移民采取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的生计策略概率越小。模型 2 显示,对易地搬迁移民采纳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的生计策略有正向作用的是社会和人力两类资本,这说明拥有这两类资本越多,易地搬迁移民采取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的生计策略概率越大。模型 3 显示,对易地搬迁移民采纳生计多样类型的生计策略有正向作用的是物质、金融两类资本,这说明拥有这两类资本越多,易地搬迁移民采取生计多样类型的生计策略概率越大。同时,对易地搬迁移民采纳生计多样类型的生计策略有负向作用的是社会资本,这说明拥有社会资本越多,易地搬迁移民采取生计多样类型的生计策略概率越小。

究其原因:首先,由于生态较脆弱、搬迁移

民受教育水平较低、社会经济落后等因素,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易地扶贫搬迁以城镇集中安置的方式为主。搬迁后,移民家庭生活生产的工具数量、就业机会、家庭收入、就业技能培训参与增多,这使得移民从事非农业生产生活的概率变大,大多数移民可不再从事农业生产生活,转而从事非农业生产生活。其次,实地调研发现,以务工为主的移民多有受教育水平较高、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较好等特点,能快速重建新的社会网络并学习新的就业技能从而进行生计转型,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提升搬迁移民的就业机会。再者,采纳生计多样类型的搬迁移民多有家庭存款和生产工具较多的特点,搬迁移民更倾向通过入股合作社、承包工程、自主创业等形式进行资本的再积累。最后,由于城镇化安置,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绿色农业产品价格较高,可获得可观的收入,搬迁移民能通过社会网络的扩展得到少数民族特色绿色农业产品的相关信息,因此,拥有较多社会资本的搬迁移民越可能会从事农业生产,因而降低其采取非农业生计策略的概率。

3. 搬迁移民生计策略转化的影响因素

采用多项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潜在影响(表 6)。模型显示,在统计学意义上,易地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转变的

表 5 不同生计策略搬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二元 Logistic 回归模型

变量	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模型 1)			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模型 2)			生计多样类型(模型 3)		
	回归系数(β)	Wals	Exp(β)	回归系数(β)	Wals	Exp(β)	回归系数(β)	Wals	Exp(β)
N	1.93	0.14	6.90	-1.67	0.15	0.19	0.49	0.01	1.63
P	-1.86***	8.73	0.15	0.25	0.23	1.29	1.26**	4.65	3.53
F	-0.15*	3.38	0.86	-0.02	0.17	0.98	0.16**	4.08	1.17
S	0.125	0.18	1.13	0.42*	2.46	1.52	-0.52*	3.92	0.59
H	-2.95*	3.40	0.05	1.54*	1.48	4.68	0.43	0.09	1.53
常数项	-5.60	10.9	0.01	1.48	1.09	4.39	1.10	0.53	3.00
Omnibus Tests of Model Coefficients	17.952***	4.899*	14.074**						
Nagelkerke R 方	0.156	0.113	0.140						
H-L 拟合优度	8.752 (P=0.364)	1.599 (P=0.591)	6.576 (P=0.583)						
样本数/户	119	233	163						

注:①***, **, * 分别为 $p < 0.01$, $p < 0.05$, $p < 0.1$ 。②根据 Omnibus Tests of Model Coefficients 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的显著水平分别为 $P < 0.01$ 、 $P < 0.1$ 、 $P < 0.05$ 。表示本次拟合的模型中,模型总体有意义。③模型 1、模型 2、模型 3 中各自变量的 VIF 系数为 1.007~1.017,平均值皆小于 5,由此判断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另外,通过特征值与条件指数判断,整体的回归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④根据 H-L 检验,模型 1 卡方值为 8.752,显著水平为 0.364,模型 2 卡方值为 1.599,显著水平为 0.591,模型 3 的卡方值为 6.576,显著水平为 0.683,可以判定本文模型拟合程度较好。

表6 搬迁移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选择的
多项式 Logistic 回归模型

生计类型	变量	回归系数 β	标准误	Wald 检验	Exp(β)
务工 为主 农业 为辅 类型	自然资本	-2.395	5.563	0.185	0.091
	物质资本	1.566**	0.674	5.394	4.788
	金融资本	0.101	0.085	1.412	1.107
	社会资本	0.164	0.354	0.213	1.178
	人力资本	3.159*	1.702	3.445	23.548
	常数项	5.050***	1.852	7.431	-
生计 多样 类型	自然资本	-1.186	5.947	0.040	0.305
	物质资本	2.315***	0.742	9.729	10.123
	金融资本	0.224**	0.096	5.474	1.251
	社会资本	-0.416	0.341	1.491	0.660
	人力资本	2.635*	1.822	2.092	13.941
	常数项	5.142	1.961	6.874	-
似然比检验 (Model Fitting Information)		Chi-square = 30.697***			
Nagelkerke R方		0.166			
样本数(户)		515			

注:①参考类别是: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②***, **, * 分别为 $p < 0.01$; ** $p < 0.05$; * $p < 0.1$; ③模型中各自变量的 VIF 系数为 1.007~1.017, 平均值皆小于 5, 由此判断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另外, 通过特征值与条件指数判断, 整体的回归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④在模型拟合优度的检验有两个, 一个是似然比检验(Model Fitting Information), 另一个是拟合优度检验(Goodness-of-Fit), 相比之下似然比结果更加稳健, 因此, 本研究采用似然比检验模型拟合优度, 卡方值为 30.697, 显著性水平小于 0.001, 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模型整体有意义。

关键因素为人力、物质两类资本。从生计策略的转化贡献率 $\text{Exp}(\beta)$ 可知,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其转变有正向影响, 其他自变量不变时, 人力、物质资本每增加 1 个单位, 易地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的生计策略转变发生率分别上升 23.548 倍、4.788 倍。原因在于, 该地区地处西南边陲, 交通不便, 资源禀赋较弱, 移民选择农业为主的生计策略主要受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影响, 且后者会造成移民家庭的机会贫困和资源贫困。易地搬迁使移民实现了空间转移和资源禀赋重组, 为其提供了就业技能培训和生产生活工具, 大大提升了外出和就近务工的就业机会, 尤其是怒江州与珠海地区的协作策略, 较大提升了移民就业率, 改善了移民机会和资源贫困问题。因此,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提升推动着搬迁移民放弃农业生产生活转而投向劳动收入更高的务工生计。

模型显示, 易地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转变的关键因素为人力、金融、物质三类资本, 且均对其转化有正向影响。从生计策略转化的贡献率 $\text{Exp}(\beta)$ 可知, 其他自变量不变时, 人力、金融、物质资本每增加 1 个单位, 易地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的生计策略转变发生率就分别上升 13.941 倍、10.123 倍、1.251 倍。人力资本指标中的家庭非农就业人数和参与就业技能培训人数的提升, 带动了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提升, 主要表现为家庭收入和家庭生产生活工具的增加。同时, 家庭收入和家庭生产生活工具的增加又进一步为其从事经营性生产提供了资本。如, 移民家庭可分时段进行生计活动, 收获季节参与特色农产品合作社的经营, 耕种季节进行农业耕种, 闲暇时经营商铺或就近务工, 而且生计多样类型的搬迁移民往往拥有更好的受教育程度和适应能力。

4. 生计资本对搬迁移民生计策略转化的影响

模型(表7)显示, 在统计学意义上, 影响易地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转变的因素有五类。在人力、物质、金融资本指标中, 就业技能培训($H1$)、家庭非农人口数($H3$)、家有资产数量($P2$)、人均年收入($F1$)、家庭存款($F4$)对其转变具有影响。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 就业技能培训($H1$)、家庭非农人口数($H3$)、家有资产数量($P2$)、人均年收入($F1$)每增加 1 个单位, 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的生计策略转变发生率将上升 1.455 倍、4.793 倍、2.880 倍、13.798 倍; 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 家庭存款($F4$)每增加 1 个单位, 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的转化发生率将降低 0.658 倍。

究其原因: 首先, 针对能力贫困和收入贫困, 深度贫困地区的移民搬迁到城镇周边, 就业培训和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数仍是生计适应、生计转型和提高家庭收入的主要策略。搬迁前, 85.4%的移民主要从事收入较低的农业生产生活; 搬迁后, 城镇生活成本升高, 在大量就业培训和东西部协作的背景下, 45.2%的移民选择

表 7 搬迁移民生计资本指标生计策略选择的
多项式 Logistic 回归模型

生计类型	变量	回归系数 β	标准误	Wald 检验	Exp(β)
务工为主 农业为辅 类型	N1	-0.450	0.733	0.377	0.637
	N2	0.434	0.607	0.510	1.543
	N3	0.334	0.514	0.423	1.397
	P1	0.948	0.773	1.502	2.580
	P2	1.058*	0.628	2.841	2.880
	F1	2.625***	0.963	7.430	13.798
	F2	0.302	0.393	0.590	1.353
	F3	0.024	0.254	0.009	1.024
	F4	-0.379*	0.294	1.657	0.685
	S1	0.467	0.429	1.189	1.596
	S2	0.801	1.088	0.542	2.228
	S3	-0.479	2.319	0.043	0.620
	S4	-0.252	0.590	0.183	0.777
	H1	0.375*	0.242	2.408	1.455
	H2	0.125	0.332	0.142	1.133
	H3	6.173***	0.867	5.060	4.793
		常数项	-0.989	0.696	2.020
生计多样 类型	N1	-0.501	0.857	0.342	0.606
	N2	0.984*	0.673	2.141	2.676
	N3	-0.031	0.555	0.003	0.969
	P1	1.794**	0.835	4.618	6.016
	P2	1.312*	0.685	3.669	3.714
	F1	2.783***	0.984	8.002	16.172
	F2	0.699*	0.409	2.917	2.012
	F3	-0.301	0.284	1.127	0.740
	F4	0.301	0.299	1.015	1.351
	S1	-0.053	0.463	0.013	0.949
	S2	0.013	1.289	0.000	1.013
	S3	-2.144	2.841	0.569	0.117
	S4	-0.952*	0.623	2.336	0.386
	H1	0.409*	0.261	2.457	1.506
	H2	-0.186	0.364	0.260	0.830
	H3	9.468***	0.964	9.646	1.294
		常数项	-1.227	0.754	2.646
	似然比检验 (Model Fitting Information)	Chi-square = 53.897***			
	Nagelkerke R 方	0.213			
	样本数(户)	515			

注:①参考类别是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②***, **, * , 分别为 $p < 0.01$; ** $p < 0.05$; * $p < 0.1$ 。③模型中各自变量的 VIF 系数为 1.06~1.472, 平均值皆小于 5, 由此判断各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另外, 通过特征值与条件指数判断, 整体的回归模型不存在共线性问题。④在模型拟合优度的检验有两个, 一个是似然比检验(Model Fitting Information), 另一个是拟合优度检验(Goodness-of-Fit), 相比之下似然比结果更加稳健, 因此, 本研究采用似然比检验模型拟合优度, 根据模型似然比检验结果, 卡方值为 53.897, 显著性水平小于 0.001, 具有统计学显著性, 模型整体有意义。

就近务工和外出务工。数据显示, 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的移民家庭人均年收入比农业为主

务工为辅类型的移民家庭人均年收入高 18%, 基于经济理性, 搬迁移民更愿意参加更多的就业技能培训以从事收入更高的非农业生产生活。其次, 针对机会贫困, 在东西部协作政策的影响下, 移民到城镇生产生活, 非农业就业机会增多。相比农业生产, 就近或外出务工就业可获得相对较高的家庭收入, 只要家庭 1 人就近或外出务工, 其获得的可观收入就会产生连锁效应, 搬迁移民家庭就会有更多人选择务工而不是务农。伴随务工获得相对较高的报酬, 搬迁移民会购买更多的家有资产(如摩托车、家用小汽车等)以方便外出务工。最后, 搬迁之前, 由于该地区移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生活, 而农业生产周期长, 容易遭受自然灾害, 面对生计风险, 家庭存款对应家庭的生计风险有重要作用。当移民可通过农业生产获得较好的存款以抵御生计风险, 就很难让其放弃农业生计; 反之, 其更愿意外出务工以增加家庭收入。

模型显示(表 7), 影响易地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转变的因素有八类。在金融、物质、人力、自然和社会资本具体指标中, 人均年收入(F1)、能否贷款(F2)、房屋面积(P1)、家有资产数量(P2)、就业技能培训(H1)、家庭非农人口数(H3)、居住地生态环境(N2)、人际信任程度(S4)对其转变具有影响。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 人均年收入(F1)、能否贷款(F2)、房屋面积(P1)、家有资产数量(P2)、就业技能培训(H1)、家庭非农人口数(H3)、居住地生态环境(N2)每增加 1 个单位, 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的转变发生率将分别上升 16.172 倍、2.012 倍、6.016 倍、3.714 倍、0.830 倍、1.294 倍、2.676 倍; 其他自变量保持不变时, 人际信任程度(S4)每增加 1 个单位, 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的转化发生率将降低 0.386 倍。

究其原因: 首先, 家庭人均年收入和贷款能力是搬迁移民进行非农经营性生产生活的基石, 城镇中经营店铺需要资金周转, 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 移民的贷款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次, 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具体指标中, 家庭资产为其开展经营性生产生活提供生产用

具,家庭非农业就业人口数越多,其务工或开展经营性生产活动的可能性就越高,家庭收入增加的可能性随之增加,也就越有利于多样化生计资本的积累。再次,移民的安置社区生态环境越好,越能让其“稳得住”,也就越有利于移民在迁入地从事非农业生产生活。最后,搬迁前,多数村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其人际信任度和互助行为相当高;搬迁后,多民族、不同村寨的搬迁移民安置在同一个安置点,以“地缘”关系为纽带,人际信任度和互助行为下降,可能会导致其放弃单一生计,不得不从事多种生计来降低生计风险。

四、结论、政策建议与进一步讨论

1. 研究结论

一方面,从多维空间理论出发,部分学者认为乡土性的空间转变为城市性的空间将会给搬迁移民带来较大的生计适应困难^[5],但是此次研究显示(表3),搬迁后,虽然怒江州少数民族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仍然较弱,但其生计资本相比搬迁前提升了20.6%。模型分析亦显示,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类型属于稳定恢复的中后期,虽然与协调发展仍有较大差距,但耦合协调度高于搬迁前,并且搬迁后不同生计策略的耦合协调度也高于搬迁前。因此,对于深度贫困的少数民族移民而言,易地扶贫搬迁成功改善移民“空间”,体现了中国扶贫搬迁是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问题的有力措施。根据表4可知,搬迁后,移民的生计转型较大,以农业为主型的移民减少了62.3%,但仍有23.1%的移民以从事农业生产生活为主;另有45.2%的移民以从事务工生产生活为主,31.7%的移民以从事生计多样型的生计策略为主。不同生计策略的生计资本和耦合协调程度不一致是受生计资本制约的结果,不同生计资本如何影响移民生计策略的选择、如何更好地发展是后期扶持的关键。而表5的研究结果显示,人力、金融和物质三类资本对易地搬迁移民采纳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的生计策略有负向影响,以农业为主的移民群体多为中老年群体,该群体的学习能力、适应能力相比青年人较差,为此需关注此类群体的其他资本;

人力和社会两类资本对易地搬迁移民采纳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的生计策略有正向影响,以务工为主的群体多为青年人,非农就业技能和关系网络是其生计发展的焦点;金融和物质两类资本均对易地搬迁移民采纳生计多样类型的生计策略有正向影响,这类移民多为受教育较好的群体,融资能力、生产工具多元化是其生计发展的重点。

另一方面,从城镇化的安置方式来看,易地搬迁移民生计策略的转变是必然的。根据表4可知,搬迁后的移民生计转型较大,而且生计策略以务工为主型和生计多样型的生计资本、生计稳定性、耦合度、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度均好于以农业为主型的移民家庭。空间的转移导致资源禀赋的变化,进而导致生计结构和生计策略的调整,在后期扶持中,移民生计策略从农业转向非农业是生计适应和发展的关键所在。进一步统计分析显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是易地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就具体资本指标而言,家庭存款对其转化有阻碍作用;家庭资产、家庭收入、就业技能培训、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用,城镇化安置使移民家庭多了非农业类型的就业机会,但就业竞争力也对其掌握的就业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就业不足的情况下,移民家庭可能需外出务工,此时家庭收入的积蓄就较为关键。此外,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是易地搬迁移民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生计多样类型转化的关键因素。就具体资本指标而言,社会信任对其转化有降低作用,居住地生态环境、房屋面积、家有资产、家庭人均收入、银行贷款、就业技能培训、家庭非农就业人口数对其转化有促进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曾经深度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东部与西部的协作和帮扶策略是短期内增加移民家庭收入、稳定就业的关键。在城镇化安置的时代背景下,易地扶贫搬迁对于少数民族移民生计行为的影响效果值得继续关注。

2. 政策建议

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扶持”必须要做好贫困治理逻辑的转换,即从地域资源匮乏的绝对贫困治理向可行性能力的相对贫困治理转

换,从国家主导的“拔穷根”“挪穷窝”到政府引导、社会市场协同、搬迁移民参与的转型,再到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县域融合发展战略的有效衔接。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第一,以产业带动就业,注重县域产业培育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加强东西协作,不断创造就业机会。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区域协调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是协调城乡发展的驱动双轮,这两个战略都以“人”为核心,强调以产业发展为重点。长远来看,要实现易地搬迁移民可持续发展,应注重安置区的县域产业培育,支持迁入地县域融合以及区域协调发展,特别是注重特色产业的壮大发展以为移民提供就近务工的机会。东部与西部的协作和帮扶策略是短期内增加脱贫移民家庭收入、稳定就业的关键,应持续深化东部与西部的协作和帮扶。对有能力且生计转变意愿较强的移民,应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培训并提供就业机会,搭建用工信息平台,培育东西协作劳务合作品牌,增加以工代赈、扶贫车间以及社区公益性岗位等就业方式,强化移民家庭就业帮扶以促进就业竞争力和生计资本的提升。

第二,以就业带动增收,推动移民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促进移民全方位就业技能的提升,支持移民多业态创业和多元化就业,持续优化就业结构,做好移民基本权益的增收。在后续扶持背景下,不同阶段的主体诉求具有动态性。在稳定阶段治理相对贫困的移民群体,主要是可持续生计能力发展下的经济理性和可行性能力保障下的社会理性。在确保“四个不摘”和“两不愁三保障”基础上,针对农业为主型的易地搬迁移民家庭,需重点加强其就业技能提升,增加家有资产,完善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帮扶措施,减低因生计不适返贫或致贫的风险;针对务工为主型和生计多样型的易地搬迁移民家庭,加强相关政策指引,提供职业化、多元化的就业技能培训,提供贷款的便利,方便其进行自主创业,提高易地搬迁移民的内生动力;针对有资金且有技术的搬迁移民,支持其自主创业和申请创业贷款,加大信贷的力度,简化信贷程序,鼓励带动更多移民进行就业创业,同

时做好信贷质量监测和续贷管理,促进脱贫移民小额信贷健康发展;针对已经从事非农业生产生活的易地搬迁移民,鼓励其将宅基地、承包地、山林地等土地资源进行流转,维护搬迁移民在迁出地的集体经济成员权益,实现增收与生态建设双赢的目的。

第三,建立搬迁移民后期扶持监测评估机制,明确监测评估体系,细化监测评估指标,动态监测搬迁移民的返贫风险。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对推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意义重大,为防止大规模返贫需建立监测评估机制,需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建立省、市、县、街道的四级动态监测评估机制,对易地搬迁移民生计发展、家庭收入、社区适应、返贫风险等因素进行监测评估,掌握易地搬迁移民的即时信息。同时,从政策预警、移民预警等方面建立健全多部门联动的风险预警、研判和处置机制,及时阻断返贫风险。另外,移民后期扶持监测评估机制的建立也有利于后期扶持退出监督考核机制的建立,从而有利于解决“扶多久”的问题。

第四,加强搬迁安置区的民族团结,促进搬迁安置区各民族的多维互嵌,尤其是文化互嵌。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发,搬迁安置区的社会治理需考虑城镇化集中安置过程中形成的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社区结构和形成的“民族互嵌型社区”;需持续开展民族团结工作,加强教育引导,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社会工作站等阵地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中华传统美德教育、汉语教学工作等来加强民族团结,以增强不同民族移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需持续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和文化服务设施,例如文化馆、村史馆等。同时,依托不同民族传统节日活动,形成不同民族交流融合的空间,推进不同民族文化融合发展。另外,需建立“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村规民约,形成不同民族搬迁移民的情感联结,从而推动社区融合治理中不同民族的多维互嵌,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进一步讨论

一是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搬迁所导致的生

计重构是剧烈的。已有研究表明,水库移民的搬迁会导致生计资本有所损伤^[15],易地搬迁对提升其生计资本有一定贡献^[23],但搬迁安置时间^[16]、安置方式^[17]等因素将对搬迁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产生不同影响。不同类型移民的生计策略和生计资本的影响不同^[23],从乡土性的空间性转变为城市性的空间性的剧烈空间再造不仅没有让少数民族移民生计发展困难,还优化了少数民族移民的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结构。不同的是,当前研究均表明拥有较丰富物质和自然两类资本的农户会偏向选择以农业为主型的生计策略,拥有较多人力、金融、社会三类资本的农户会偏向选择非农为主型的生计策略^[21, 23, 30-31]。空间的转移和资源禀赋的变化是易地搬迁移民生计策略选择的根本,从“新主体陌生人社区”到剧烈空间再造^[4-5, 39, 40-41],少数民族移民的空间和资源禀赋有差异,导致其选择生计策略有差异。对于刚脱贫的少数民族,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其生计发展的关键。同时,本研究结果与已有的研究结果存在一定的差异,如,自然资本未对以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的生计策略选择造成影响;银行存款对移民家庭由农业为主务工为辅类型向务工为主农业为辅类型的转化具有负向影响,固定资产在生计转变的影响因素与某些研究结论不一致等^[29, 42]。这需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分析生计策略与影响因素的深层次逻辑联系。

二是此次研究基于怒江州 515 户的调查数据展开,后期应持续收集和积累数据,旨在揭示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生计选择行为的动态变迁过程。另外,此次分析着眼于少数民族移民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差异,生计资本、生计策略与生计选择行为的影响,而安置方式、安置时间、搬迁距离等亦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篇幅所限,将在后续的研究中给予关注。

三是已有的研究呼吁关注易地搬迁移民的后期扶持,而搬迁移民后期扶持的关键在于城镇化安置后的生计发展和返贫风险治理。本研究发现,针对少数民族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发展,在生计策略层面上推动移民生计策略的选择和转换是非常重要的,即城镇化安置后需在

不同空间和资源禀赋上做出最优选择。然而,这种空间和资源禀赋基础上的生计策略选择和转换,今后在什么政策、机制中得以实现?不同群体应该实现何种意义上的转变?后期扶持应该扶持多久?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和跟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7-8.
- [2]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云南怒江州“十大巨变”彰显千年跨越[EB/OL]. [2021-02-26]. <https://www.nujiang.gov.cn/xxgk/K3957471X/info/2021-157016.html>.
- [3]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政府.盘活“三块地”念好“三字经”——怒江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实践模式[EB/OL]. [2022-03-28]. <https://www.nujiang.gov.cn/xxgk/K3957471X/info/2022-191596.html>.
- [4] 丁波.新主体陌生人社区: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重构[J].广西民族研究,2020(1):56-62.
- [5] 王寓凡,江立华.空间再造与易地搬迁贫困户的社会适应——基于江西省X县的调查[J].社会科学研究,2020(1):125-131.
- [6] 张军.空间重组中的回迁社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基于K社区的实地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7):136-145.
- [7] 胡业翠,刘桂真,何鑫茹.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生态移民区农户生计资本分析——以广西环江县金桥村为例[J].农业经济,2016(12):37-40.
- [8] 苏芳,徐中民,尚海洋.可持续生计分析研究综述[J].地球科学进展,2009,24(1):61-69.
- [9] CHAMBERS R, CONWAY G R. 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 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 [J]. IDS Discussion Paper, 1991(296): 1-2.
- [10] MARTHA G, ROBERTS 杨国安.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国际进展——脆弱性分析方法与可持续生计方法比较[J].地理科学进展,2003(1):11-21.
- [11] 李树苗,徐洁,左冬梅,等.农村老年人的生计、福祉与家庭支持政策——一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J].当代经济科学,2017,39(4):1-10.
- [12] 孙海兵.水库移民生计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

- 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11.
- [13] McDOWELL C, HAAN A D. Migration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7 (65): 1-30.
- [14] 徐锡广, 申鹏.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性生计研究——基于贵州省的调查分析 [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8(1): 103-110.
- [15] 严登才. 搬迁前后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实证对比分析 [J]. 现代经济探讨, 2011(6): 59-63.
- [16] 贾国平, 朱志玲, 王晓涛, 等. 移民生计策略变迁及其生态效应研究——以宁夏红寺堡区为例 [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6, 37(3): 505-513.
- [17] 李聪, 柳玮, 冯伟林, 等. 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陕西安康地区的调查 [J]. 中国农村观察, 2013(6): 31-44.
- [18] 伍艳. 贫困山区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四川省平武县和南江县的调查数据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3): 88-94.
- [19] 赵雪雁, 李巍, 杨培涛, 等. 生计资本对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21(4): 111-118.
- [20] 苏芳, 蒲欣冬, 徐中民, 等. 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研究——以张掖市甘州区为例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9, 19(6): 119-125.
- [21] 冯伟林, 李聪.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恢复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陕西安康的农户调查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7(2): 73-81.
- [22] 高天志, 陆迁. 风险管理可以提高农户生计策略适应性吗——基于时间配置中介效应和收入水平调节效应的分析 [J]. 农业技术经济, 2021(5): 48-62.
- [23] 刘伟, 黎洁. 提升或损伤?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9, 24(3): 210-218.
- [24] 马明, 陈绍军, 陶思吉, 等.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生计策略、生计资本与家庭收入影响研究——以云南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为例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8): 1-10.
- [25] 范乔希, 万青. 生计资本对农户可持续生计活动的影响分析 [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10): 65-69.
- [26] 李聪, 郭嫚嫚, 李萍. 破解“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发展困境?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的“福祉-生态”耦合模式分析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9, 33(11): 97-105.
- [27] 孙特生, 胡晓慧. 基于农牧民生计资本的干旱区草地适应性管理——以准噶尔北部的富蕴县为例 [J]. 自然资源学报, 2018, 33(5): 761-774.
- [28] 赵雷, 张海霞. 西南林区水电移民安置区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稳定性耦合协调分析——以四川西部地区为例 [J]. 林业经济, 2022, 44(7): 22-37.
- [29] 赵文娟, 杨世龙, 王潇. 基于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研究——以云南新平县干热河谷傣族地区为例 [J]. 资源科学, 2016, 38(1): 136-143.
- [30] 杨世龙, 赵文娟, 徐蕊, 等. 元江干热河谷地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机制分析——以新平县为例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6, 30(7): 19-23.
- [31] 周丽, 黎红梅, 李培.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基于湖南搬迁农户的调查 [J]. 经济地理, 2020, 40(11): 167-175.
- [32] 曾福生.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机制构建 [J]. 求索, 2021(1): 116-121.
- [33] 刘林, 徐天骄. 生计资本与农户收入: 来自新疆深度贫困地区的经验证据 [J]. 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4(1): 24-32.
- [34] 李聪, 王磊, 李明来.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易地搬迁、家庭贫困与收入分异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0, 30(7): 140-150.
- [35] 赵剑治, 陆铭. 关系对农村收入差距的贡献及其地区差异——一项基于回归的分解分析 [J]. 经济学(季刊), 2010, 9(1): 363-390.
- [36] 陈锡文, 韩俊. 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与经验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238.
- [37]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人民政府. 州情概况 [EB/OL]. [2022-05-26]. <https://www.nujiang.gov.cn/2022/0526/13035.html>.
- [38] 朱安新, 高熔. “养儿防老”还是“养女防老”? ——中国老年人主观意愿分析 [J]. 妇女研究论丛, 2016(4): 36-44.
- [39] 郑娜娜. 空间变革下的生计策略与养老保障——基于易地搬迁老年移民养老方式的考察 [J].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24(4): 116-124.
- [40] 马明, 陈绍军, 陶思吉. 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减贫效应与生计发展研究——以三区三州怒江州地区为例 [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21, 35(10): 16-23.
- [41] 陈绍军, 雷鸣, 孙杰, 等. 农村水库移民农地转入意

愿及其影响因素——以贵州平桥水库安置区为例 [J].水利经济 2022, 40(6): 95-101.

[J].水利经济 2022, 40(3): 77-81.

(收稿日期: 2022-02-19 编辑: 高虹)

[42] 朱运亮. 水电移民生计空间重构与可持续发展

The Influence of Livelihood Capital ,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d Livelihood Choice Behavior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on Prosperity/CHEN Shaojun^{1,2} , MA Ming^{1,2} , TAO Siji^{1,2}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1100 , China; 2. China Immigration Research Center , Hohai University , Nanjing 211100 , China)

Abstract: More than 9.6 million people have relocated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 with more than 73% of the relocated popul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How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relocated population is the key to follow-up support for reloca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515 minority households in Nujiang Prefecture in three districts and three prefectures ,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of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ability were established to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livelihood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 , livelihood strategy sele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living capital level of relocated immigrants is low at this stage , and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iving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ability is in a stable recovery period.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livelihood capital and livelihood stability of immigrant families in the type of labor-based agriculture supplemented and diversified livelihood is better than that of agriculture-based labor supplemented. Amo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hoice of livelihood strategies , physical capital , financi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immigrant families with agriculture as the main activity and labor as the auxiliary type , while human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immigrant families with the employment as the mainstay and agriculture as the auxiliary type , and physical capital , financial capital , and social capita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immigrant families with diverse livelihoods. The key factor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immigrants from agriculture-based and labor-assisted types to labor-based and agricultural-assisted ones are physical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 in which the amount of household assets , income , employment skills training , and the number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The key factor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immigrants from agriculture-based labor-related types to livelihood-diversified ones are physical capital , financial capital , and human capital , in which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place of residence , housing area , amount of household assets , income , bank loans , employment skills training , and the number of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 it is proposed that in the post-relief period for ethnic minority immigrants out of poverty ,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employment skills training , increase credit , increase income from land resources , deepen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 and focus on county-level industry cultivation.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ethnic minority areas;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livelihood choice; coupling coordination type; follow-up support